

改革開放與語言規劃

陳原

畢生致力於中國語文事業的倪海曙先生彌留之際拉着我的手說：「文改萬歲！」這個感人的情景，我在《讀書》雜誌上透露了。不料有朋友看了大驚失色，慌忙跑來追問：「這是開放改革的年代了，難道你們還要搞文字改革？」這一問倒也着實使我吃了一驚，原來這位朋友竟把文字改革看作洪水猛獸。我安慰他：別慌，文字改革其實就是西方說的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規劃規劃，為甚麼改革開放反而不能搞規劃了？

問題出在「文字改革」這個語詞的語感 nuance 上。也許自然語言比起計算機語言來就多了這麼一點點語感。「改革」往往使人聯想到「革命」，「革命」又聯想到「流血」，因而「文字改革」帶有破壞性的語感，誘導人們聯想到消滅漢字，禁絕方言，否定傳統，乃至改用洋文來寫華語，一切都拋棄了，連祖宗也不認了。這其實是一種善意的誤解。也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久而久之，「改革」兩個字就會消失它原來的破壞性語感，轉而具有一種開明的、進步的現代化味道——因此，「文字改革」這個語詞也不那麼使人望而生畏，見而生厭了。

一般地說，文字改革其實就是語言規劃，這有書為證。四年前英國出了一部語言學專著^①，其中關於「語言規劃」的一章，有幾段涉及中國五十年代以來文字改革的內容，包括簡化字、普通話、拼音。不過論述也有不確切的地方，譬如書中說，人們打算把漢字的一半都簡化掉。且不說沒有一種文獻說過要簡化一半漢字，何況這一半的基數以何者為準，也很費斟酌。是以《說文解字》所收字數為基數呢，還是以《康熙字典》所收為準？可見這種提法是不夠科學的。實際上簡化漢字總方案在上述專著出版的那一年（1986），由國家政權機關重新予以公佈（帶有極為微小的改訂），在這個字表以外的俗寫都沒有被確認。至少可以認為，一個時期以內簡化工作已讓位給文字規範化工作了——文字不能天天變，甚至不能年年變，必須穩定一個長時期，這才有利於社會交際。

語言文字的規範化和標準化，也許可以認為是當前中國在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中的語言規劃工作的重心。也是在1986這一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建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並且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正式宣告了上述的工作重心。

口語的規範化——即推廣普通話的工作，被提到優先的地位。這是由改革開放的形勢和國策所要求的，而不是語言學界主觀的決策。改革開放需要一種對外交際工具，這種工具必須為全民族多數人所公認、能接受的一種口語，需要國內五十六個民族之間有一種全國通用的口語，需要已經有了書面語的公用語〔丹麥的語言學家耶斯佩森（Otto Jespersen）稱之為「語際語」（interlanguage）〕。在今日的中國，

這種公用語就是以北京音為語音標準、以北方方言為其語彙語法基礎的普通話。普通話具有超方言的交際作用（但消失了作為母語的方言所帶有的感情色彩），它是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規範化口語。由此可見，普通話不企圖也不可能代替方言，更絕對辦不到消滅方言。

至於當代中國通用的書面語（現代漢語），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夠達到規範化的現代目標。這項工作包括例如異體字的鑒別、整理和淘汰，漢字輸入計算機（電腦）方式的篩選和確定（確認若干種），屏幕顯示漢字的點陣（dots of matrix）規範，通用字盤的確定和定期檢驗增刪補正，常用漢字和次常用漢字的確定和定期檢驗增刪補正，新聞用字、地名用字、人名用字、科學要求創造的新漢字等等的建議和確認，因社會生活的變化而出現的新詞語的蒐集、篩選和確認，漢語方言地區創制的方塊字的篩選和吸收，等等都在現代漢語書面語規範化工作的範圍之內。

至於標準化，主要是科學術語（scientific terminology）提出的要求。術語標準化對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全過程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術語學是近年成長的一門多科性交叉學科，實質上它是應用社會語言學（applied sociolinguistics）的一個重要分支。術語最基本的要求是貫徹術語單一性原則，即一個科學概念只能用一個術語表達，而一個術語（在特定學科內）也只能代表一個概念。術語標準化是當前中國一個重要的語言工程。

被中外人士誤解和非議的漢語拼音方案，已經歷了三十年的實踐考驗。平心而論，這個方案已證明是具備強大生命力的。在國際上它已由聯合國的國際標準化組織 UN-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 確認為用羅馬字母轉寫中國專名的唯一正式符號系統 [所謂羅馬化（Romanization），即三十年代稱拉丁化（Latinization）]。利用這套符號系統進行信息檢索已取得公認的效果（作為國家圖書館的北京圖書館也採用了這套檢索系統）。近年來在國內一些小學（由黑龍江省開始）試驗的「注音識字、提前讀寫」，也就是利用拼音方案進行的——這項語言工程雖還沒有作出科學總結，但很大一部分教育界人士對它評價很高，認為這個實驗不但提高了學童的語文理解力和表達力，而且由此增強了學童的思維能力，成果是令人鼓舞的。這個實驗還在進行中，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正如拼音方案本身還有待進一步完善。至於拼音系統是否能夠代替形聲系統——通俗地說即拼音化是否能代替方塊字——這樣的帶有全民族文化發展的戰略性問題，在本世紀肯定沒有條件作結論，恐怕在二十一世紀，儘管經過長期、踏實的研究、實驗，也還是作不出結論來的。

1990年11月1日

①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by Ronald Wardhaug, 1986, chapter 15, Language Planning.